

文学伦理学批评在美国的 传播与第三系统的构建¹

郑杰

摘要: 2004年中国学者聂珍钊教授提出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引起了美国文学批评界的关注和讨论。由中国学者提出的具有鲜明本土特色的文学批评理论, 为什么能够在美国学界获得关注和共鸣? 本文从传播学和系统论的交叉视角, 将文学伦理学批评在美国的传播视为两个系统(中国文学批评和美国文学批评)的交流, 其意义在于交流秩序的重构和以文学伦理学批评为可能的世界文学批评系统即第三系统的建立。

关键词: 文学伦理学批评; 美国; 传播学; 系统论; 第三系统

作者: 郑杰,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文学院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戏剧和文学伦理学批评。代表论文发表在 *German Quarterly*, *Brecht Yearbook*, 《文学跨学科研究》《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等权威核心期刊, 出版英文专著 *Towards an Ethical Subject: Brecht and China* (2020)。邮箱: zhengjie1997@hotmail.com

Title: Towards a Third System: Dissemination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n America

Abstract: In 2004, Professor Nie Zhenzhao proposed the theory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n China, which has since initiated serious discussion in Western academia. This article examines why a literary criticism theory with distinct local characteristics proposed by a Chinese scholar can gain attention and resonance in the American

1 本文为(中国)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资源与对外传播研究”【项目批号: 21&ZD264】的阶段性成果。

academic communit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and system theory, this article regards the dissemination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an exchange between two systems of criticism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ry criticism), reconstructing the order of exchange and establishing a system of world literary criticism (the third system) represented by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Keywords: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merica; communication studies; system theory; third system

Author: Zheng Jie is Professor at the Faculty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Cultur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He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contemporary theatre studies and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Her representative works have been published in *German Quarterly*, *Brecht Yearbook*,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Literature*,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and *Foreign Literature*, and her English monograph *Towards an Ethical Subject: Brecht and China* was published in 2020. Email: zhengjie1997@hotmail.com

2015年,美国学术期刊《比较文学和文化》(CLCweb: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第5期发表了由聂珍钊和尚必武主编,以“21世纪文学和伦理”为题的文学伦理学批评专刊,这标志着文学伦理学批评作为一种批评理论和方法自2004年在中国出现后开始引起了美国学界的关注和严肃讨论。正如聂珍钊指出,文学伦理学批评在中国的产生源于美国伦理学批评思潮且融合了中国传统道德思想,是跨文化传播的产物。²那么我们不免要问,为什么由中国学者提出的具有鲜明本土特色的文学批评理论,能够在美国学界获得关注和共鸣?这是对研究者及其理论的个别反思还是归因于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理论的“猎奇”心态?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本文讨论的是文学伦理学批评在美国的国际传播和建构,但我们采取的是传播学和系统论的交叉融合视角,将文学伦理学批评在美国的传播视为中国文学批评和美国文学批评这两个系统的交流及交流秩序的重构,并将文学伦理学批评视为世

2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8页。

界文学系统即第三系统的建立。从系统和交互关系的角度来理解文学伦理学批评在美国的传播，有利于我们将关注的焦点从独立自主的个体转移到系统之内的个体。考察文学伦理学批评在美国的传播作为文学批评系统交流的特征，一方面让我们重新审视文学作为一门知识独立系统的预设，另一方面揭示了以文学伦理学批评作为世界文学批评系统建立的可能性。而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阐明如何用系统论视角来考察文学伦理学批评在美国的传播和第三系统建构的运作机制。

相对于一般的“系统”概念对整体和内部组成元素之间关系的关注，卢曼（Niklas Luhmann）在其主要著作《社会系统》（1984）中提出了“自创生”（Autopoiesis）系统的理论，致力于从社会系统的角度来理解社会，强调从构成自身的要素中再生产自身。换句话说，卢曼不再将系统看作是构成要素的组合，而更强调“作为差异的系统”如何在“沟通”（或者说“交流”）中，实现自我生成，它既具有（操作上的）封闭性、又具有（对于环境的）开放性特点。系统存在的首要前提是系统/环境的区分，同时系统又将这一区分重新输入系统内的每一次操作，生成更复杂的区分。³ 借助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本文将文学批评作为一个专门知识的系统。⁴ 沿此思路，文学伦理学批评在美国的传播不等于研究者的个体学术行为，也不再是中国文学批评系统和美国文学批评系统的两种系统差异的讨论，而属于文学交流过程中的“自创生”系统过程。基于两种文学批评系统/环境的区分，文学伦理学批评在“沟通”中实现自我编程化运作，通过系统与环境的互动，不断建构核心概念和理论的边界和含义，在自我再生为第三系统的同时，通过自我指涉（Selbstreferenz）实现自身秩序的产生和维持。讨论文学伦理学批评在美国文学批评环境中作为第三系统的生成，首先厘清文学伦理学批评和中国文学批评系统以及美国文学批评系统之间的“区分”关系。

3 尼可拉斯·鲁曼：《社会系统：一个一般理论的大纲》（*Soziale systeme: Grundris einer allgemeinen Theorie*），鲁贵显、汤志杰译，台湾：暖暖书屋，2021年，第77-86页。

4 范劲在《德国的中国文学研究的运作机制：一个系统论视角》用系统论视角来考察德国的中国文学研究的运作机制，其视角对于本文具有借鉴意义。具体参见：《人文杂志》，2021年第7期，第26-38页。

一、从伦理学批评到文学伦理学批评

20世纪60年代，在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反文化运动、环境保护运动的推动下，美国出现诸如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黑人美学、文化批评等伦理批评潮流。80年代，美国学者韦恩·布斯（Wayne Clayton Booth）从读者接受的角度出发，聚焦读者的伦理和文本的伦理，强调通过主体间交换的模式发现文学的意义和价值。事实上，以布斯和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为代表的“伦理转向”（ethical turn）理论家，往往将文学的伦理批评和叙事批评融合并在叙事批评的框架下进行文学批评。上世纪末美国文学批评界对文学中伦理问题的关注和讨论与美国的思想传统和社会、学术语境密切相关，我们可将“伦理转向”的意义理解为美国学术系统内，一种对文本内部解读思考方法的纠正。尽管此次转向实现了从原来文学批评中的“伦理学研究”到“伦理批评”的实践，并对传统道德批评与伦理批评进行了区分，但并未将伦理批评提升到方法论高度，也未形成独立的批评流派。

我们可以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体系中发现布斯的影响。尽管布斯和聂珍钊在阅读、分析和阐释文学的批评方法上采取了不同的术语和路径，但他们对于文学的伦理功能达成了基本共识，即“从伦理视角认识文学的伦理本质和教诲功能”。⁵然而，如果仅仅停留在两者思想的表层区别，往往会忽略文学伦理学批评在系统中的真正符号含义。中国学者倡导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尽管建立在美国伦理批评的发展经验上，但在和美国伦理批评的区分上生成了核心概念、理论框架和批评范式，将文学伦理学批评上升至方法论的高度，同时还提出了极具社会价值的观点，即文学伦理学批评是“从伦理视角阅读、分析、阐释和评价文学的批评方法，它强调回到历史的伦理现场，站在当时的伦理立场上解读和阐释文学作品，寻找文学产生的客观伦理原因并解释其何以成立，用伦理的观点对事件、人物、文学问题等给予解释，并从历史的角度做出道德评价”。⁶该定义的提出与界定，实现了系统产生的两个基本特征：

5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3页。

6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外国文学研究》，2010年第1期，第12-22页。

自我指涉和自我生成。这种自我指涉建立在与系统 / 环境的区分和界线划分, 体现方法论上的创新。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特征是: 第一、认为文学的基本功能是“教诲”作用。文学是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随着人们对伦理表达的需求而产生的, 从而“从起源上为文学伦理学批评建立了理论基础”; 第二、对伦理批评与道德批评进行了区别性分析, 在研究伦理批评与伦理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审美批评与伦理批评的概念; 第三、建立了完整的批评话语体系和核心概念, 如伦理选择、伦理身份、伦理环境、伦理禁忌等, 并且提供了运用这些术语进行文本批评的范例。⁷

倘若我们将文学伦理学批评放在中国文学批评系统 / 环境中, 我们会发现它和中国伦理和美学思想一体化的传承和推进。例如, 中国古代文论和文学批评虽然是以文学道德教化论为主线, 但其以“诗言志”“美刺”说、“文以载道”为核心范畴的文学本质论和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体系的内核基本一致。⁸同时, 文学伦理学批评也是在中国文学批评语境中关于伦理学和中国文学理论的创新(或者说自我生成)。以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关键术语“人性”为例。聂珍钊将“人性”定义为, 人作为人而非兽存在的本质属性, 即人的道德属性是决定人能够成为人的美德。⁹这一定义看似相悖于西方关于“human nature”的主流定义, 实际上折射的是两套文化系统中关于人的理解。需要说明的是, 在中国思想语境中, “人性”并不等同于西方 human nature 的概念。以往的误解和错误源于翻译过程中的“完美词典谬误”(the Fallacy of the Perfect Dictionary), 即寻找和原词一一对应的译入语。文学伦理学批评关于“人性”的定义是对两套文化系统的反思, 从这个意义上讲, 它进入了对世界文化系统本源的追问。通过孟子、荀子和告子关于“人性”的系列阐释, 聂珍钊指出, 先贤哲学思想中的“人性”实际上是“人、人的本能、人的本性、人的人性”的概念集合。孟子、荀子和告子在定义人不同于其他生物的本质属性时, 指

7 杨革新:《文学研究的伦理转向与美国伦理批评的复兴》,《外国文学研究》,2013年第6期,第16-25页。

8 苏晖:《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资源研究的问题域》,《华中学术》,2022年第4期,第1-12页。

9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73页。

向的是伦理意义上的概念（“关于人性，孟子讲人伦、告子讲仁义、荀子讲礼义”），并且，三者在此意义上持有相同观点，即人可以通过后天学习和道德修养来实现修身养性，将本性转换为人性。¹⁰

尽管文学伦理学批评源于美国的伦理批评，然而作为一种文学批评理论和方法，它属于中国思想语境内的自治功能系统，有自己的编码（理论术语）和实现编码的具体规则（理论框架），同时接受所在社会系统的指令。文学伦理学批评既实现了中国文化系统内部的继承和发扬，同时在系统交互关系中重新在中国语境内部定义“人性”，反思和西方文学批评系统中 human nature 概念的差异。这不仅是概念理解的表面差异，也是两套意义系统在哲学层面的概念差异，折射出不同的理论基础和世界观。

二、文学伦理学批评在美国的传播

文学伦理学批评在美国的传播，表面上看是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的成立、文学伦理学批评国际学术会议的举办、以及国际期刊论文的发表，即理论介绍、建设和实践的三个维度的合力推动，其实质是一种文化思想进入另外一个系统的接受、融合和变化发展的过程。这两条线索一明一暗、一显性一隐形，只有从两个层面来考察文学伦理学批评在美国的传播，我们才能发现在人类文明思想史进程上这一辩证时刻的意义所在。

文学伦理学批评在美国传播的标志性事件是 2012 年“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的成立，这是文学伦理学批评走向国际的标志，也是在美国传播的开始。

随着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的成立，美国开始了对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系统引介和评价。2015 年，普渡大学比较文学中心主任查尔斯·罗斯（Charles Ross）在中美合办的国际学术期刊《世界文学研究论坛》（*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发表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建构：聂珍钊访谈录》（“A Conceptual Map of

10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273 页。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n Interview with Nie Zhenzhao”)。该访谈围绕着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基本概念及其理论构建,重点讨论了“自然选择”和“伦理选择”等概念,其中聂珍钊以古希腊的斯芬克斯和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为例,充分阐明了他的观点。该访谈的意义在于,美国学者第一次从西方的视角开始试图理解中国文化语境下产生的文学理论,更准确地说是美国文学批评的符号系统中来理解和接受新的且产生于中国文化语境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的有益尝试。

2017年,美国学术期刊《文体》(*Style*)发表题为《〈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引介》(*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的书评,强调了该书在中国文学系统内部的地位和意义,即对中国文学批评界存在问题的纠正和理论创新。具体表现为:第一、针对学界流行的“理论情结”“预设话题情结”“术语情结”,强调了理论研究和批评实践的结合;第二、面对中国文学批评界存在的对西方批评理论的盲目追从,提出了新理论和新观点。这篇书评第一次从中西文化系统交互的作用中评价文学伦理学批评:“这本书的出版不仅是对西方伦理批评复兴的回应,也是中国学者在文学批评方面的理论创举。正如聂珍钊所言,‘文学伦理学批评不是给西方的同行和传统的道德批评提供一个新的理论名称,而是要建立自己的术语和批评机制’”。¹¹

2019年,美国学术期刊《比较文学研究》(*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第2期发表长篇评论《聂珍钊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诞生》(“Nie Zhenzhao and the Genesis of Chinese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评论不仅论及了文学伦理学批评在中国文化系统中的内部演变,也回顾了其在国际文化系统中的传播和接受过程:“自2004年至2018年的15年时间里,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尽管遭到一些批评者的怀疑,……但借助在首尔、塔尔图、伦敦和九州举行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文学伦理学批评成为了在国际上接受的批评理论。”¹²至此,学者开始意识到文学伦理学批评代表着一种新的可能的世界文学批评系统:“文学伦理学批评是在西方伦理转向

11 Yang, Gexin.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y Nie Zhenzhao (review). *Style*, Vol.51(2), 2017, pp.270-275.

12 Tian, Junwu. Nie Zhenzhao and the Genesis of Chinese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review).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Vol.56(2), 2019, pp.402-420.

的时代背景下建构的，它植根于中国的文学与文化土壤，已经成为了解释东方和西方文学文本的重要文学批评理论”。¹³ 这种新的世界文学批评系统本质上是比较文学也是文学跨学科研究。文学伦理学批评有别于以往单一的研究范式，它从跨学科的角度出发，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来拓展文学伦理批评的边界。

202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聂珍钊和苏晖共同主编的五卷本《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这套丛书代表着文学伦理学批评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最新研究进展，美国学界很快对此做出了回应。2021年，美国学术期刊《比较文学研究》发表关于《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A Study on the Theory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的书评，详尽介绍了这套丛书的内容。这篇书评的重要意义在于，指出了文学伦理学批评作为一种新的世界文学批评系统的“内在属性”：“这套丛书拓展和深化了理论的基本立场、概念和方法，系统地梳理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发生和发展过程，拓展了伦理文学批评的边界，并试图构建一个融合了伦理学、美学、心理学、语言学、历史、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模式”。¹⁴ 2021年，美国学术期刊《文体》（*Style*）也发表书评《对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批评和评价》（“*Criticism and Evaluation of Nie Zhenzhao's Studies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第一次提出文学伦理学批评作为一种理论自治的新的文学系统的地位，这意味着美国学界开始超越对中国文化系统的“凝视”和“猎奇”：“这部五卷本的大典作为一个里程碑，标志着具有东方和西方特色的文学伦理批评的发展和完善”。¹⁵ 2022年，美国期刊《文学和艺术研究》（*Journal of Literature and Art Studies*）发表文章《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最新研究发展》（“*The Latest Development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World*”），进一步讨论文学伦理学批评作为第三可能系统如何产生新的意义：它既是文学系统的参与者，也是全球化的交流媒介，以批评的方式促成文学的全球性互动。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

13 Tian, Junwu. Nie Zhenzhao and the Genesis of Chinese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review).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Vol.56(2), 2019, pp.402-420.

14 Duan, Shaoming Duan. A Study on the Theory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y Nie Zhenzhao (review).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Vol.58(3), 2021, pp.691-696.

15 Tian, Junwu & Duan Yingjie. Criticism and Evaluation of Nie Zhenzhao's Studies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review). *Style*, Vol.55(4), 2021, pp.573-588.

在比较文学和跨学科的视阈中重新审视欧洲、美国和亚洲文学。例如，丛书的中国卷梳理了中国文学中伦理概念的产生、发展和重构；日本卷通过考察日本文学四个发展阶段的伦理维度，在比较和对比中探讨日本文学和中国文学的文化同根性以及文学、美学、文学伦理学之间的各自特点；第二、重新审视文学流派的伦理特质。例如，将莎士比亚的《雅典的泰门》放置在契约伦理和馈赠伦理的冲突中，由此重新考察文艺复兴时期关于人和人性的认识。¹⁶

以上分析容易形成一种误解，即文学伦理学批评作为一种世界文学批评系统的建立，仅仅表现为在美国的理论介绍和阐释。事实并非如此，一种系统建立的可能性取决于自身在编码层面的独立，同时它也决定了意义生成的结构方式。正是通过在美国学界的批评实践，文学伦理学批评超越西方学界的“他者”视角，实现了交流秩序的重建，同时确立了其作为新的世界文学批评系统产生意义的多样性和可能性。

文学伦理学批评在美国的批评实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21世纪的小说批评和诗歌研究。接下来，我们将详细介绍美国学术期刊《比较文学和文化》2015年第5期出版的“21世纪小说和伦理”专刊，具体讨论文学伦理学批评如何在文学批评的实践活动中重构交流秩序的规则，并生成自治的功能符号系统。这期专刊共包括13篇文章，均从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对文学作品进行解读，涉及的国别文学包括美国、中国、韩国、英国、加拿大和德国。该专刊论文分别涉及这一系统论中的7个基本概念：一是伦理选择：涉及的论文有《麦卡锡的〈路〉和末世的伦理选择》（“McCarthy's *The Road* and Ethical Choice in a Post-Apocalyptic World”）、《李恢成的〈流域〉（*Watershed Above*）和金城一纪的GO中的父子伦理》（“Ethics of Father and Son in Ri's *流域 (Watershed Above)* and Kaneshiro's GO”）和《〈别让我走〉中的作为“他者”的克隆人》（“Human Cloning as the Other in Ishiguro's *Never Let Me Go*”）；二是伦理身份：涉及的论文有《伍慧明〈望岩〉和任璧莲〈梦娜在希望之乡〉中的伦理身份》（“Perspectives of Ethical Identity in Ng's *Steer toward Rock* and Jen's *Mona in the Promised Land*”）和《门罗

16 详见徐彬主编：《英国文学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32-47页。

小说《激情》中的伦理困境和虚无主义》（“Ethical Dilemma and Nihilism in Munro’s *Passion*”）；三是伦理秩序：涉及的论文有《安扎杜尔的《边土：新梅斯蒂扎》中的土著性、流散性和伦理转向》（“Indigeneity, Diaspora, and Ethical Turn in Anzaldúa’s *Borderlands/La Frontera*”）；四是叙事伦理：涉及的论文有《阿迪契的小说《美国史迹》中的叙事伦理和他异性》（“Narrative Ethics and Alterity in Adichie’s *Americanah*”）、《德里罗〈堕落的人〉中的“反叙事”伦理》（“Ethics of Counter-Narrative in DeLillo’s *Falling Man*”）、《严歌苓的小说〈老师，好美〉中的伦理话语和叙事策略》（“Ethical Discourse and Narrative Strategies in Yan’s *老师，好美 (To My Teacher, with Love)*”）和《作为现代伦理小说的黑塞的《荒野狼》》（“Hesse’s *Steppenwolf* as Modern Ethical Fiction”）；五是涉及的论文有斯芬克斯因子：《严歌苓小说〈陆犯焉识〉中的伦理转型》（“Ethical Transformations in Yan’s *陆犯焉识 [The Criminal Lu Yanshi]*”）；六是自然选择和伦理选择：涉及的论文有《莫言小说〈四十一炮〉中成长的伦理体验》（“Luo’s Ethical Experience of Growth in Mo Yan’s *Pow!*”）；七是伦理困境和伦理顿悟：涉及的论文有《麦克尤恩小说〈儿童法案〉中的伦理困境和伦理顿悟》（“Ethical Dilemma and Ethical Epiphany in McEwan’s *The Children Act*”）。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这些概念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核心术语，组成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基础，它们处于相互关系中并与文学环境发生关系。由此以来，这些文学批评实践活动既支撑了文学伦理学批评作为一种系统的正常运作，也促使其逐渐从原有系统中分化出来，功能也逐渐独立，在这一过程中它不仅重新定义并超越了中国的文学批评系统和美国文学批评系统的边界，且在分离的过程中自我构建了一种新的世界文学批评系统，或者说，成为世界文学中新的结构。

三、作为世界文学批评的一种可能系统

如前所述，以文学伦理学批评为代表的世界文学批评系统即第三系统的建立是一个渐进过程，这一过程的实现取决于中国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要“走出去”。而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要“走出去”，首先要了解国外学者在两种文化系统产生关系的前期如何观察中国理论。

文学伦理学批评在美国的传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实验场，可通过观察其结构性特征，掌握文学伦理学批评在美国的发展路径和规律。具体来说，观察文学伦理学批评在美国如何被引介，如何在中美两种文学批判系统的交互关系中逐渐生成自治的功能系统，实现编码及解码的具体规划，最终产生类似社会系统的指令，从而生成理论自治的一种可能的世界文学批评系统。这一过程必然涉及文学伦理批评在美国的“变异”形态，这既有其自身的生成环境，同时也折射出美国对中国的认识，即“如何面对中国”的问题。从传播学和系统论的角度来认识“走出去”问题，认识他者和我们建构文学批评系统的方式有何不同，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形成不同文化和思维方式沟通的普遍性交流媒介。接下来，我们将转换视角，从美国文学批评系统的视角来考察文学伦理学批评在美国传播的特点和趋势，其中既涉及美国学者对中国文学批评批评这一“他者”系统的认知，也包括美国学者对“自我”系统的反思，以及在此两个系统的区别和交互关系中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如何自我生成新的符号系统的方法和过程。

美国学界对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主动接受和碰撞是 21 世纪中美文化交流的成果，或者说是两种文化系统的规定而非阐释的结果，这既是中国国家政治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提升的象征，也是世界文化多样性和繁荣的需要。美国文学批评系统作为自治的系统，需要中国文学批评系统充当世界文学理论的对照和界定。2015 年加州大学欧文分校主办首届“批评理论学术年会”，会议的核心议题是“理论有批评价值吗？”（Is Theory Critical?），其出发点是思考批评理论在 20 世纪八十年代被广泛引入文学艺术批评和社会科学的定性研究之后，又何以在当下批评实践中走入颓势。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特别提及中国批评理论在西方的接受与应用，并“鼓励大家密切关注世界进程，赞扬中国对世界批评理论的贡献，倡导与中国学者积极对话”。¹⁷会议第三场主题发言为“全球化、网络化与中国崛起背景下的文学新象与批评理论建构”，其中欧文分校教授、欧洲科学院院士邓·阿贝勒对新世纪的中国外国

17 夏延华、乔治斯·梵·邓·阿贝勒：《让批评理论与世界进程同步——首届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批评理论学术年会”侧记》，《外国文学研究》，2015 年第 6 期，第 170-172 页。

文学研究现状做了深入分析，还提及积极参与与西方学者对话的中国批评家北京大学的申丹教授、清华大学的王宁教授和华中师范大学聂珍钊教授。他特别评价了聂珍钊教授近年提出且不断完善的文学伦理学批评，肯定了这一创新学说在世界学术话语中的地位。

考察文学伦理学批评在美国的传播，显然不可避免美国学界对于“他者”的认知视角，这是因为不同系统的运作规则和结构决定了对于不同系统的认识永远在“自我”的参照和边界中进行。2017，国际期刊《文体》(Style)发表的《伦理文学批评导论》书评中强调，这本书是“所有对中国当代文学领域感兴趣的人的必读之作”。然而，这种对“他者”的认知也并非总是引向分歧，这也可能建立对于美国文学批评和中国文学批评的批评范式和具体实践在系统结构和功能上的相似点的认同。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斯坦福大学讲座教授玛乔丽·帕洛夫(Marjorie Perloff)在2014年第四届文学伦理学批评国际学术研讨会评价说：“中国学者提出的文学伦理学批评意义非凡，不仅复兴了伦理批评这一方法本身，而且紧紧抓住了文学的本质与基本要义。换言之，文学伦理学批评在很大程度上帮助读者重拾和发掘了文学的伦理价值，唤醒了文学的道德责任。”¹⁸帕洛夫这里提出了两个观点：第一、伦理批评是中国文学批评和美国文学批评两种系统结构中的共通本质(“文学本质与基本要义”)；第二、文学的道德责任是两种系统共有的功能。正是建立在对这种文学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认同上，构建世界文学批评系统即第三系统才有实现的可能。

对中国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评价和推崇折射出美国学界对美国学术流派和文学批评现状的批判。这种批判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新时期伦理道德价值的缺失，二是文学批评中理论话语取代文本研究的倾向，三是文学批评中政治话语的一味倚重。邓·阿贝勒认为，“相比传统道德批评而言，以文学伦理学批评为方法论的文本读解和作家与读者的关系研究将更有助于引导新人类拣选适用于新时期的伦理道德标准，确立自由与责任的尺度”。¹⁹2018年，克洛德·

18 转引自邓友女：《中国文学理论话语的国际认同与传播》，《文艺报》，2015年1月14日，第003版。

19 夏延华、乔治斯·梵·邓·阿贝勒：《让批评理论与世界进程同步——首届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批评理论学术年会”侧记》，《外国文学研究》，2015年第6期，第170-172页。

罗森在“第八届文学伦理学批评国际研讨会”指出，“西方文学批评热衷于用理论话语取代文学文本而忽略对文本本身的研究，聂珍钊教授的文学伦理学批评是对这一趋势的逆转。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理论至上的趋势已经导致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大学一味采用各种理论和方法来进行文学研究，不去研读文学文本，发掘与文本相关的历史知识”。显然，美国学界已经意识到文学伦理学批评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主流批评话语之间互动且互补的关系，这便为文学伦理学批评重构交流秩序，并生成新的世界文学批评系统提供了可能性。

构建文学伦理学批评成为新的世界文学批评系统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它具有自身系统的要素、结构和功能，并且能够生成意义。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系统要素是其基本概念和术语；其系统结构本质是“它摆脱了规定性或定义性的束缚。它根植于人类原始神话，正如聂珍钊在他的著作中所阐述的那样，是对事件中心的回应。……从聂珍钊对国际上诸多原始神话模式的旁征博引可以看出，文学伦理学批评确实不属于一个民族，而是属于全世界”；²⁰其系统功能是，“在历时的语境中从伦理的角度思考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人与自我间的伦理秩序和道德问题可以帮助我们去认识人类伦理道德标准的流变轨迹，而且，文学伦理学批评对于文学批评向德育和审美功能的回归提供了动力”。²¹

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在接受和应用这一理论中，通过批判实践共同探索建构这一系统的可能形式，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在比较文学和美学领域对文学伦理学批判理论的“挪用”和新的意义的生成，这也促进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2016年，汉克·雷泽尔（Hank Lazer）在《世界文学研究论坛》（*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发表《伦理学批评和创新诗歌带来的挑战》（“Ethical Criticism and the Challenge Posed by Innovative Poetry”），其中他明确表示，“希望为伦理学批评的运用继续开疆辟土，在现当代诗歌，特别是创新性当代诗歌的研究中加入文学

20 引自克洛德·罗森（Claude Rawson）在“第八届文学伦理学批评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致辞”。

21 引自克洛德·罗森（Claude Rawson）在“第八届文学伦理学批评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致辞”。

伦理学批评的方法”。²²他在文章中提出了一系列可能扩大和延展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方法和范围的问题，例如，通过讨论爱默生关于精神体验的语言对伦理维度进行问题化或重新定位，由此分析读者和批评家如何通过诗歌创新中参与原诗中的伦理体验、选择和行动；抑或通过比较孔子和老子著作中伦理观点的差异，指出认识的不精确性和神秘性。2018年，美国普渡大学哲学系教授伦纳德·哈里斯（Leonard Harris）发表《文学伦理学批评与艾伦·洛克的美学理论——中美伦理批评对比研究》一文。他首先确定文学伦理学批评作为一种文学系统的普世价值，然后通过比较阿兰·洛克的美学主张理论与聂珍钊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来进行例证。他认为，正是因为关于实质性的“道德”并未形成共识，而不同人群对伦理美德和行为的定义也不尽相同，因此洛克和文学伦理学批评提倡的价值观是容忍、尊重和互惠的普世伦理价值态度，这种价值态度对人类来说是有益的。

由此可见，文学伦理学批评在中国文学批评系统和美国文学批评系统的交互关系中产生，同时作为一种全球性相互观察的文学批评方法，它在美国语境的传播中被重新构建为“第三系统”，即成为跨学科的世界文学批评系统。它具备科学和文学艺术属性：作为科学系统一部分，它的职责是全球化的文学系统；而作为文学系统的参与者，以批评的方式促成文学的全球性互动。正是在这种系统上的边界突破，文学伦理学批评作为第三系统成为全球化的交流媒介。

结语

通过文学伦理学批评在美国文学批评系统中的传播，我们可以发现个体阐释始终受制于知识和社会系统的调控。系统如何参与意义赋予并产生新的问题意识，这也将是文学伦理学批评作为第三系统今后的可能研究方向。比较文学和跨学科文学意味着交互观察和交流，由此来看，文学伦理学批评将不再局限于文学理论形式的观察和知识的功能分化，或者不再受限于民族和地域的边界，而是作

22 Lazer, Hank. Ethical Criticism and the Challenge Posed by Innovative Poetry.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Vol.8(1), 2016, pp.1-18.

为世界文学批评系统在文学批评理论的效力范围实现交流过程中的意义生成。

参考文献

1. 邓友女：《中国文学理论话语的国际认同与传播》，《文艺报》，2015年1月14日。
2. 范劲：《德国的中国文学研究的运作机制：一个系统论视角》，《人文杂志》，2021年第7期。
3.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判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4.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外国文学研究》，2010年第1期。
5. 尼可拉斯·鲁曼：《社会系统：一个一般理论的大纲》，鲁贵显、汤志杰译，台湾：暖暖书屋，2021年。
6. 苏晖，《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资源研究的问题域》，《华中学术》，2022年第4期。
7. 徐彬编：《英国文学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
8. 夏延华 & 乔治斯·梵·邓·阿贝勒：《让批评理论与世界进程同步》，《外国文学研究》，2015年第6期。
9. 杨革新：《文学研究的伦理转向与美国伦理批评的复兴》，《外国文学研究》，2013年第6期。
10. Duan, Shaoming. A Study on the Theory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y Nie Zhenzhao (review).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Vol.58(3), 2021.
11. Lazer, Hank. Ethical Criticism and the Challenge Posed by Innovative Poetry.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Vol.8(1), 2016.
12. Tian, Junwu. Nie Zhenzhao and the Genesis of Chinese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review).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Vol.56(2), 2019.
13. Tian, Junwu & Duan Yingjie. Criticism and Evaluation of Nie Zhenzhao's Studies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review). *Style*, Vol.55(4), 2021.
14. Yang, Gexin.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y Nie Zhenzhao (review). *Style*, Vol.51(2), 2017.